

国家图书馆藏《道德经》外文译本述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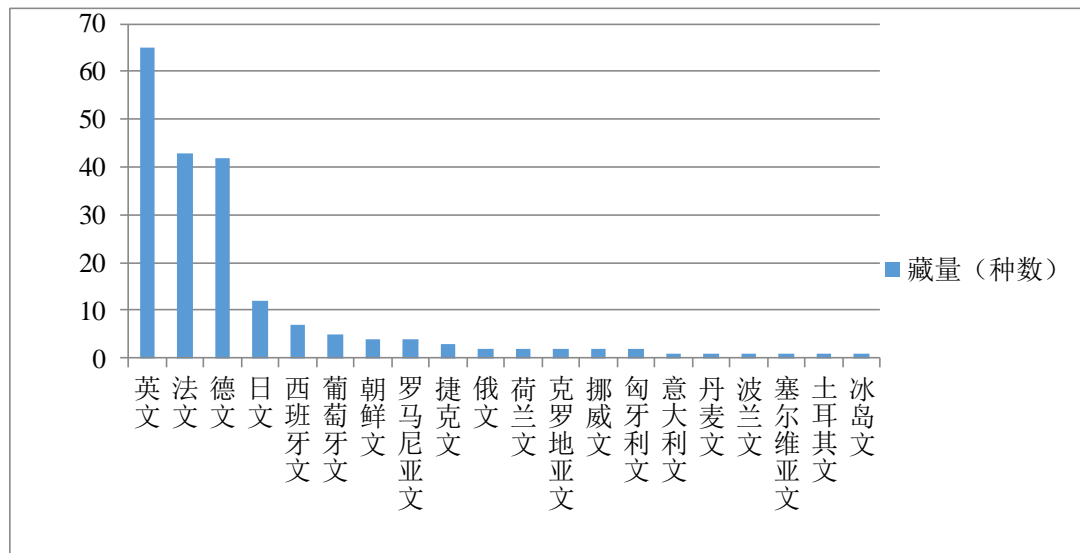
□ 张彦希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

《道德经》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的代表之一，在世界上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，“《道德经》是除了《圣经》以外被译成外文最多的世界文化名著，其西译本高达 643 种，仅英译本有 206 种”^①。国家图书馆（以下简称国图）作为国家总书库，亚洲规模最大的图书馆，存有大量《道德经》外文译本，涵盖语种广，并存有许多知名译本的珍贵文献版本，颇具研究价值，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传播的影响力。

一、国图《道德经》外文译本馆藏情况

国图《道德经》外文译本藏量丰富，据笔者统计，截至 2022 年 1 月，共有约 207 种《道德经》外文译本。按照年代及文献类型不同，分别收藏在古籍库、外文藏书库、海外中国问题资料研究库等及外文文献阅览室、国际赠书阅览室等阅览室。馆藏外文译本所涵盖的语种也是极其广泛，包含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日文、西班牙文、意大利文等在内的约 20 个语种，其中英文、法文和德文依次是藏量最多的语种。国图馆藏《道德经》外文译本涵盖语种与藏量统计见表 1：

表 1 《道德经》外文译本语种与藏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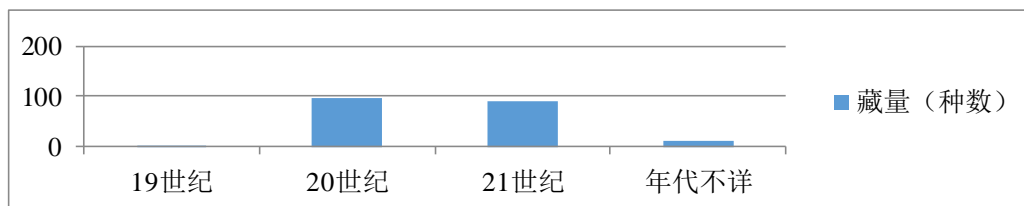


从语种和藏量来看，国图比较重视收藏西文《道德经》译本，欧洲地区小语种译本也有收藏，也反映了《道德经》在欧洲地区影响甚广，其传播到的国家颇多，是极具影响力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。就年代来看，国图馆藏《道德经》外文译本可分为四大类：19 世纪（1900 年以前）出版的译本有 3 种，其中 1 种为英译本，是 1868 年英国伦敦出版的湛约翰（John

^① 李书影、王宏俐：《〈道德经〉英译本的海外读者接受研究——基于 Python 数据分析技术》，《外语电化教学》2020 年第 2 期，第 35 页。

Chalmers, 1825—1899) 译并著序言的《道德经》译本, 该译本被认为是最早的《道德经》英译本, 另外 2 种为德译本, 其中有 1870 年德国出版的由最早的《道德经》德文译者史陶斯 (Victor von Strauss, 1808—1899) 所译介的译本, 这 3 种译本都不失为珍贵的外文善本, 兼具历史、文献与收藏价值; 20 世纪 (1901 至 2000 年) 出版的译本有 96 种, 占据了国图《道德经》译本馆藏的大部分, 可见 20 世纪出版了大量《道德经》外文译本, 一些欧洲国家如荷兰、冰岛、波兰、挪威等都对《道德经》进行了译介和出版, 亚洲包括日本、韩国和土耳其等国家也有译本出版; 21 世纪 (2000 年后) 出版的外文译本有 94 种, 短短 22 年时间已经有很多译本相继出版; 另有年代不详译本 14 种。国图《道德经》外文译本馆藏按出版年代分类见表 2:

表 2 《道德经》外文译本出版年与藏量 (种数)



在这三个时期出版的《道德经》外文译本中, 国图馆藏中收录的英文、法文和德文译本占比最大。这也反映了《道德经》在西方传播经历的“三次高潮”, 19 世纪的《道德经》译本与基督教的传播息息相关, 因此这时期的译本大多是由传教士译介到西方世界的, 比如国图馆藏《道德经》最早的英译本与德译本, 都是由当时著名传教士翻译, 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, 传教士“大多根据自身理解对《道德经》进行翻译, 缺乏对《道德经》文本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深厚中国文化内涵的观照与探究”^①, 但就文本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而言, 这个时期的译本属于珍贵的外文善本, 极具收藏价值。第二次高潮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, 西方出现了“反思、批判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潮, 以及社会思想的多元化”^②, 老子的“无为而治”等思想迎合了西方社会的反战情绪和追求和谐的愿望,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, 为何在这一时期在西方世界会出现大量《道德经》译本, 并且流传甚广。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世界各国思想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入, 《道德经》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又经历了第三次高潮, 这一时期译者开始“采用西方哲学的概念、范畴和分析方法对《老子》进行解析”^③, 出现了大量《道德经》译本和相关研究的著作。

二、国图馆藏《道德经》知名西文译本简介

学界普遍认为, 老子《道德经》最早的英译本是 1868 年在英国伦敦出版的湛约翰 (John Chalmers, 1825-1899) 译本^④, 该文献保存状况良好, 内容完整, 书况较好, 是极具代表性的《道德经》外文译本馆藏, 具有历史研究和收藏价值。湛约翰是从英国伦敦远赴中国的传教士, 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和研究兴趣, 还曾就《道德经》翻译问题与其他同期译者

^① 武志勇、刘子潇:《《道德经》在西方世界传播的历史》,《湖南大学学报》2020 年第 5 期, 第 16 页。

^② 武志勇、刘子潇:《《道德经》在西方世界传播的历史》, 17 页。

^③ 武志勇、刘子潇:《《道德经》在西方世界传播的历史》, 18 页。

^④ John Chalmers, *Dao de Jing: The Speculations on Metaphysics, Polity, and Morality, of "The Old Philosopher," Lau-tsze*, London: Trubner & Co., 1868, p. 1.

展开论辩,试图寻求最准确的翻译方法。湛约翰译本最大的特色就是善用注释,“他通过引用西方学者诗人的名言和诗文,与原文产生互文性,从而达到解释原文和激发读者联想的作用”^①,帮助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。但作为传教士,湛约翰译本的宗教色彩明显,“处处暗含了与基督教教义对比的意图”^②,因此,也存在其局限性。

被学界研究较多,且较为经典的老子《道德经》标准英译本为理雅各(James Legge, 1815-1897)译本。国图馆藏1989年英国邓弗里斯郡出版^③的译本,书况较新,内容完整,保存状况好。理雅各首次将“道”的概念音译为“Tao”,认为“道是一种现象而非一种存在,因此翻译时最好只进行一定的描绘,而非试图找到与其功能、意义对等的词”^④。这种译法后来普遍被译介所接受,在后来的各种英译本中,使用“Tao”来代表“道”的概念非常常见,包括其衍生词汇“Taoism”(“道教”)也是由此而来。同时,理雅各也使用了与湛约翰类似的翻译方法,通过添加长篇评论与注释,便于本国读者接受和理解。不论是湛约翰还是理雅各,身为传教士的他们虽以传教为目的,但他们作为中西文化联结的桥梁,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此外,国图还藏有老子《道德经》最早的德文译本,即1870年德国莱比锡出版的史陶斯(Victor von Strauss, 1808—1899)译本^⑤,其内容完整,保存状况好,书况良好,兼具研究价值与收藏价值。史陶斯译本深受早期法国译者儒莲等影响,在翻译中加入很多详尽的评论与注释,对后来的《道德经》德文译者影响深远,也为《道德经》在德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,“让尚未了解老子思想的读者更易理解,这种排版形式也成为之后《道德经》译本常用的模式”,“1923年版的《勃洛克豪百科辞典》将史陶斯的译本称为‘最佳德译本’”^⑥。但是,同样作为传教士的史陶斯在译文中无不体现出浓重的基督教色彩,着重研究“道”与“上帝”的关系以及老子对于“上帝”的理解,在基本准确传达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同时,也包含着强烈的宗教意味。

老子《道德经》经典德译本是传教士卫礼贤(Richard Wilhelm, 1873—1930)的译本,他的译本经过了多次再版和修订,在德国乃至西方世界影响甚广。国图藏卫礼贤《道德经》德文译本9种,可见其译本的影响力和研究价值,其中最早的是1923年德国耶拿出版的译本^⑦。该译本保存状况较好,内容完整,书况较新。卫礼贤极其尊重原文和中国文化,他认为“与其将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作品进行现代化还原,不如通过翻译让老子自己发出声音”^⑧。他不断地钻研和学习,专注于文本本身,如翻译“玄”这一概念,他并没有采用某一对应词汇来翻译,而是根据文义,选用不同翻译方法,如译为“Geheimnis(秘密、奥秘)”“inner

^① 李东:《释“道”——最早〈道德经〉英语全译本注释研究》,《苏州教育学院学报》2011年第3期,第46页。

^② 姚达兑:《译玄:最早英译〈道德经〉(1859)译文初探》,《中国文化研究》2016年冬之卷,第136页。

^③ James Legge, *The Texts of Taoism*, Thornhill, Dumfriesshire: Tynron Pr., 1989, p. 1.

^④ 吴海燕:《理雅各〈道德经〉译本中文化因素的处理方式》,《景德镇高专学报》2014年第5期,第30页。

^⑤ Victor von Strauss, *Laò-Tsè's Tao te King*, Leipzig: Friedrich Fleischer, 1870, p. 1.

^⑥ 唐雪:《1945年以前〈道德经〉在德国的译介研究》,《燕山大学学报》2019年第3期,第44—46页。

^⑦ Richard Wilhelm, *Lao Tse Tao te King: 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*, Jena: Eugen Diederiche, 1923, p. 1.

^⑧ 唐雪:《1945年以前〈道德经〉在德国的译介研究》,第46页。

（内部的、内心的）”“im Verborgenen（在隐秘之处，在看不见的地方）”等^①。这种翻译方式后来也被广泛采用和接受。卫贤礼作为传教士，虽然译本中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，但其更专注于文本，对《道德经》在德语世界的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三、结 语

随着中国的崛起，中华传统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，对于像《道德经》这样的具有中华文化代表性的典籍研究和译介著作也越来越多，我们更要扩宽采访渠道，收集更多相关典籍研究和译本文献，可侧重收集亚洲语种的译本及研究著作，进一步丰富馆藏；更要注重珍贵版本的收集，特别是外文善本的收集，如各大语种早期译本和经典译本，对已有的早期译本文献做好文献保护工作，进一步发掘其历史文化价值。同时，也要加强对典籍译本的数字化开发工作，更好地呈现给读者，方便相关译介研究的开展，也为进一步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做出贡献。

^① 邓舒：《卫礼贤对〈道德经〉重要概念的翻译评析》，《西部学刊》2019年8月上半月刊，第51页。